

古籍丛考

金德建 著



● 中华文史精刊 上海书店 中华书局

中華文史精刊

中華書局
上海書店
出版

金德建著

古籍叢考

本书根据中华书局一九四一年版复印

古籍丛考

金德建著

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影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1/2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

J173·1 定价 1.50 元



自序

本書所集論文，凡二十一篇，皆余歷年所作，關於古籍源流方面考證之文字。近頃旅居滬濱，工作之暇，重行檢閱一過，覺所研究雖創見無多，而每篇樹義，尙具條貫，不爲輕易立說，遂編訂以成本集。惟所論及，不止一書，而每書又往往僅取一二要端，加以考辨，未暇張皇，尙希讀者不吝指教，是幸。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金德建自序。



古籍叢考目錄

自序

一	論語名稱起源於孔安國考	一
二	兩漢論語今古文源流考	三
三	戰國策作者之推測	八
四	尸子作者與爾雅	二七
五	淳于髡作王度記考	三四
六	王度記天子駕六與漢今古文經說	四二
七	慎子流傳與真僞	四七
八	荀子大略篇作於漢人考	五〇
九	荀子賦篇作於秦地考	五二
十	荀子非十二子篇與韓詩外傳卷四非十子節之比較	五四
十一	司馬兵法的真僞與作者	五六



- 十二 司馬兵法兵車出師之今古二說及其來源之解釋……………六七
- 十三 孫子十三篇作於孫臏考……………七三
- 十四 司馬遷所見周官卽今王制考……………八五
- 十五 漢文帝使博士諸生作王制考……………八七
- 十六 孟子王制所述制度相通之證……………九四
- 十七 王制尺度田畝之解釋……………一〇二
- 十八 董仲舒的著作與春秋繁露……………一〇八
- 十九 李育公羊義四十一事輯證……………一一四
- 二十 白虎觀與議諸儒學派考……………一三九
- 二十一 白虎通義與王充論衡之關係……………一五七

古籍叢考

一 論語名稱起源於孔安國考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所謂『論言弟子籍』、『論語弟子問』，是同一之書的異稱，原來都指論語。漢書藝文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論語記孔子言語，所以史記中可以稱爲『論語』或『論言』。至於書名上又加『弟子籍』、『弟子問』的稱法，就因爲這些言語的內容是『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故云『弟子問』；而記錄編纂者亦出於弟子門人，故又可云『弟子籍』。並且史記說：『出孔氏古文』，漢志說：『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這也相合。史記封禪書又曰：『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引論語陽貨篇辭，而又稱傳。各處稱法顯然不一致，這是因爲論語二字名稱原來出於孔安國所定的論衡正說篇說：

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始曰論語。

據此，最初只稱『論』，如云齊論、魯論、古論，尙係沿襲舊名。宣帝時稱『傳』，蓋別於經而言，非書名也。但亦非始於宣帝。

時，如史記封禪書引論語，已稱『傳曰』；其後揚子法言至篇引論語，稱『吾聞諸傳』；漢書外戚傳引『傳曰：以約失之者鮮』，語實出於論語里仁篇，皆其例證。至於論語一名的產生，雖始於孔安國，一時亦未普遍流行；後以經生傳授，都用這個名稱，纔把論語名稱確定了。本來有幾種經書名稱，都是武帝時規定的。如尚書則劉向別錄說：『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君名之。』初稱『書』，至歐陽氏始加『尚書』之稱。詩經未另定名稱，歷來就只稱一個『詩』字。所以史記中稱論語，命名上不一律，乃因孔安國始定名論語，其時尚未普遍流行之故。

二 兩漢論語今古文源流考

漢代論語版本有三。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論語類說：

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多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魯二十篇。

一 齊魯論

漢志稱齊論云：『多問王知道。』何晏論語集解序也說：『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據此，齊魯論的不同，乃是齊論的內容比較魯論爲多；篇章章句有增多，而齊魯相同諸篇章諸章的文字上，仍舊無異。至於古論與魯論相比較，文字上完全不同，一種是古文本，一種是今文本；論到內容篇章多少，倒是完全相等的。名義上魯論二十篇，古論二十一篇，實者古論是將二十篇中堯曰篇後另分一篇，纔生出二十一篇的。所以魯古內容是相等的，獨有齊論特別多出二篇。

漢志謂齊論『多問王知道』，王應麟云：『問王疑當作問玉。』（漢書藝文志考證）按說文玉部：

璵字下引逸論語：『玉粲之璵兮，其璵猛也。』

瑩字下引逸論語：『如玉之瑩。』

這二條當即問玉篇遺文。知道篇則已不可考見。（馬國翰據王制正義輯得齊論知道篇一條；問玉篇尚有初學記、文選注、

太平御覽所引數條）說文謂之逸論語，猶如漢代儀禮之外稱爲逸禮，二十九篇尚書之外稱爲逸書者相同。

齊論何以會多出二篇？大概漢初論語原只有二十篇，後人另外加上二篇，而成齊論。論語的篇幅也同其他古書一樣，常被後人增益。最初在孔門弟子時是幾篇，雖不得確知，但是據崔述的考證，二十篇中的末五篇是戰國時人所加。如是漸漸的再由二十篇而增至二十二篇，也未始不在意料之中。論語的情形，跟孟子彷彿。孟子的篇數，司馬遷所見只有七篇（孟子荀卿列傳），到了漢志便有十一篇，這就是自司馬遷至班固期間被增四篇。幸而孟子到趙岐手裏，把外書四篇刪去，後世不傳；論語也幸而到了張禹手裏從魯論二十篇爲定，不用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僞書，後世不傳。

張侯論的確是魯論原本。但經典釋文敘錄却說：

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後人贊成釋文之說者，如臧琳經義雜記說：

據此則張侯論已不全爲魯論，厥後包、周所注，列於學官者，皆是本也。鄭康成就包、周之本，以齊論、古論校正之，凡五十事，則鄭本論語又參合古、齊、魯三書定之，非張、包、周之舊矣。（經解本卷一百九十五論語今文古文條）

通常對於張侯論和鄭本的觀察，大都和臧氏相同；實者此種觀察都是差誤。鄭本留在後面再論。對於張侯論觀察的差誤，是因爲釋文所說『擇善而從』的話，根本已靠不住。我們看：

一 何晏論語集解序說：『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釋文的話原是根據這集解序而來，其實集解序所說『從之』乃是『兼講齊說，善者從之』，只從齊論的『經說』並不是齊論的篇章文字。

二 漢志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漢志把傳齊論的人與傳魯論的人，很明白底分成兩派。其中張禹明明是傳魯論，跟齊論無涉。這是最強的確證。莊固時距張禹尚不遠，班說當屬可信，不是魏何晏、唐陸德明可比。

三 張侯論最後而行於世。鄭康成注的就是用張侯本子。考鄭注中只有所謂『魯讀某爲某，今從古，』從沒有說起過齊論；於此可知鄭康成僅以古論來校正原本魯論，未曾運用齊論；並不如集解序所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如是，他的原本是魯論，不是齊論，即可證明張侯論是魯論，而非齊論。

知道了張侯論之爲魯論，則我們因此還可以明瞭：齊論雖多二篇，也曾曇花一現的顯過一時，終究影響是沒有的，通行的本子，仍舊只有魯論。

二 古論 齊魯論是漢代流傳過的，而古論顯於世則爲後起。古論與魯論不同，是在文字同異上，桓譚新論說：『文異者，四百餘字。』後來東漢馬融纔把古論校定行世。（別詳拙著『經今古文字考』）所以古魯二論文字上儘有不同，篇幅是不會不等。

鄭康成就是根據古論來校正他的原本張侯論的文字。經典釋文說：『鄭本以齊，古改正凡五十事。』這五十事是那幾字？照理在鄭注裏應該說及，可惜今傳本是何晏集解本；集解采諸家之說，鄭注只居其一；凡鄭氏說及改正魯、古相異的注解，都不采在集解裏面。

關於這些文字相異，陸德明經典釋文雖後於何晏集解，却供給我們不少材料。唐代鄭注論語想來還沒有完全亡佚；不但告訴我們鄭注改的有五十事的數目，并且還告訴我們改的是那幾字。清人徐養原曾將這些抄出疏證而著論語魯讀考。不過徐氏的工作，尙未盡善，因為：

一 沒有分出今古文。有些字都用假借或聲音相近來講通，其實魯、古不同，性質上只是今文古文的關係而已。

二 徐氏搜集得不完全。只把釋文『魯讀某爲某，今從古』等二十三句當作魯、古不同，不知釋文上的『鄭作某』也指魯、古不同。所謂『鄭作某』者，原卽鄭玄之另據古論文字。這點不明瞭，不始於徐氏，歷來皆然。如毛奇齡四書騰言也說：『釋文可見者，二十三事，皆從古也。其從齊當有二十七事，不可考；或陸時齊論已缺耶。』說鄭氏曾從齊論，已誤；而從古之可考見者，實際亦不止此二十三事。把釋文上的『鄭作某』和『魯讀某爲某，今從古』的二十三事合併起來計算，剛巧也有五十條左右。如是可知釋文所云『五十事』者，必定就是指這五十條了。

陸德明時，通行論語是何晏本，陸云『鄭作某』者，何以知其必爲鄭據古論？我們是可以證明的。如：

見冕 鄭本作弁

按『繞衣裳者』條下鄭云：『魯讀弁爲繞，今從古。』則知作『冕』卽『繞』字（說文『冕』爲『繞』之或體）爲魯論，作『弁』字者爲古論。又如：

齊人歸 鄭作饋

按『詠而歸』『歸孔子豚』條鄭云：『饋魯讀爲歸，今從古。』則知作『歸』字者魯論，作『饋』字者爲古論。

三 戰國策作者之推測

戰國策的作者是誰？一向所不明瞭的，也很少有人提出來討論過。

班固說起司馬遷作史記時曾採戰國策，但是史記中却没有提起過所謂戰國策的名目。史記中記了許多司馬遷所見過的書，何況這是曾經採用過的呢！不過戰國策的名稱屬於劉向所定（見劉向戰國策序），在較前的史記時候，當然還沒有產生。如是便得發生一個問題：司馬遷見過的戰國策，在當時叫做什麼名稱？依我的假設，即蒯通書。

一

先從史記看起。史記田儋列傳說：

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二人。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

劉向以前的戰國策本來還沒有定出確當的名稱，現在史記這段話中蒯通著書是有的，有沒有定出書的名稱也還是疑問，司馬遷只是混說蒯通的書有八十一首，說不出書名來，這情形戰國策與蒯通書是符合。後面推測戰國策的作者問題，便用史記這一段話爲出發點。

二

史記田儋列傳說：『蒯通者，善爲長短說。』這『長短說』很可注意。主父偃傳說：『學長短縱橫之術。』漢書張湯傳說：『邊通學長短。』據此可見長短說的內容是講縱橫的術數，蒯通善爲長短說，他無疑的是長短說的整理成書者，而主父

假輦乃是後來的『學長短』者。但是再看到漢書張湯傳顏注說：『戰國策名長短書。』所謂『長短書』者，原來就是戰國策的別名，這就可想見戰國策原本是翻通他們的書了。

三

戰國策的篇數，根據劉校及漢志均屬三十三篇。至於漢志所記蒯通僅止五篇，然而漢志所記主父偃亦有二十八篇，以二十八篇加上了五篇，剛巧也是三十三篇。蒯通主父偃與戰國策的關係既如前述，而他們的著書的篇數，加起來竟然又與戰國策的篇數相等，這篇數的符合，更足以使我們相信蒯通主父偃的書原即是戰國策無疑。漢志上蒯通主父偃二家的書並不曾亡逸，實際就是一部戰國策在漢代有時候分析爲二書。

戰國策的著者原來不止一人。劉向序說：『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書名如此的不統一，則其著者爲非一人可知。大概蒯通先成五篇，而其餘二十八篇主父偃續，說不定還不止主父偃一人。總之，續的篇數是二十八篇。劉向見了這許多雜亂的書，而內容却都是記載國縱橫的事情，於是併成一書，號曰戰國策。

至於漢志春秋家已有戰國策三十三篇，而縱橫家復有蒯通主父偃者，這重複並不足爲蒯子等不是戰國策之證，因爲漢志的體裁本有這互著的一例（章實齋說），可以彼此著錄的。春秋家是劉向定本新的戰國策，而縱橫家的蒯子等乃是未定以前的舊戰國策。

四

史記稱別種的書的數目都稱幾『篇』或幾『章』，獨有蒯通書稱之爲八十一首。這首字很可玩味。章或篇指長篇

文字，首就不一定長篇，或數十字或多至數百字。八十一首，照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八十一小節。這樣稱之爲『首』，也與戰國策相符，戰國策的體例確是將許多短節的記事合成的。而且現在的國策有分篇，在當初史記時候還沒有給劉向編定成篇，所以稱之爲『首』。

現在的戰國策每篇約有十餘首，蒯通書漢志有五篇，以每篇十餘首計之，則與史記所云蒯通書八十一首亦合。

因爲蒯通是長短說的整理者，是戰國策最早一個的著者，所以蒯通的八十一首史記已經見到，而主父偃的書在史記中就沒有說起了。主父偃雖與司馬遷並時，大概著書或爲主父偃以後的一派人所著。史記中採用戰國策大約有八九十事（姚寬云：『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黃丕烈云：『今數之多不合。』）與他僅見的蒯通八十一首的數目相差不多，這也是蒯通書卽是戰國策而被史記採取的明證。

五

蒯通，齊國人，所以戰國策中紀事亦以齊爲最多。今本三十三篇的分法，雖爲劉向所定，但是其中屬於齊國的已經占有六篇，比較各國爲最多，這也可看出是齊人蒯通所作，所以紀事偏重於齊國。

六

漢書蒯通傳記載蒯通說徐公，說韓信，說曹相國的幾篇文字，其中文辭的誇誕好辯以及文法的組織，都與戰國策毫無二致，可知蒯通的才能確也有著戰國策的可能。所以黃東發也說：『蒯通口辯，不在儀秦下。』其實不但儀秦的口辯是出於蒯通所描寫，卽全部戰國策也都是蒯通他們所作的。說苑引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

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慚。』主父偃也是重言與辭，同劇通一樣。

七

通常以爲戰國策是先秦書，大約是根據二點：

1. 劉向說過：『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

2. 漢志早已著錄此書，班固且謂史記曾採及之，後人就以爲是很古的書，含含糊糊當他是先秦書了。

此外再想不出什麼別的理由了。即以這二點論起來，也是很有問題的。史記的確曾經採及過戰國策的，然而西漢司馬遷所採及，却並不能就此說戰國策便是先秦書。漢志固然已經著錄戰國策了，然而漢志著錄各書，更不是每部都是先秦書。劉向序以爲是戰國策士的戰國策，這句話似乎可爲戰國策是先秦書的根據了。但是劉向却並沒有說出這些策謀游說的紀事即屬於戰國時候游士親自所記載。所以當作戰國策係先秦書，根據是非常薄弱。

秦代焚書的唯一動機，是因爲策士的游說議政（見始皇本紀），假定戰國策是先秦書，那末焚書時，則可是燒書的目的所在，當然在必燒之列的。而且燒書的結果，六藝並不會亡，諸子百家不亡，秦紀不亡，周亡的只有諸侯史記。這戰國策的一宗史料，正合所謂諸侯史記，假定牠是先秦書，又要必亡的。所以戰國策既然已經被史記採及而史記的六國表序又說過：『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爲藏。』可見司馬遷自己口中判定秦代以前的諸侯史記早已都給始皇燒去。那末戰國策必定作於漢代，不會是燒書以前的作品，無異早已告訴我們了。